

主编◎唐先田 陈友冰 本卷编著◎唐先田 杨四平等

安徽文学史

第二卷（现当代）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安徽文学史

ANHUI WENXUESHI

第三卷（现当代）

主编◎唐先田 陈友冰

本卷编著◎唐先田 杨四平 等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徽文学史. 第三卷(现当代)/唐先田,陈友冰主编.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11

ISBN 978-7-5396-4750-0

I. ①安… II. ①唐… ②陈… III. ①地方文学史-安徽省-现代②地方文学史-安徽省-当代 IV. ①I209.9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5625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朱寒冬 秦 雯

装帧设计: 许含章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65859551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35.75 字数: 60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六编 现代安徽文学

第一章 走在文学革命前列的现代安徽文学 / 003

第二章 陈独秀与胡适的文学革命 / 011

第一节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 011

第二节 胡适的文学主张与白话诗尝试 / 019

第三章 灿若群星的现代安徽诗歌 / 037

第一节 陈独秀的旧体诗 / 037

第二节 汪静之与湖畔诗社 / 052

第三节 朱湘与现代格律诗 / 064

第四节 方令孺、方玮德与新月诗派 / 076

第五节 许承尧、吕碧城的旧体诗词 / 082

第六节 田间与街头诗运动 / 088

第四章 现代安徽作家与鲁迅 / 100

第一节 皖西作家群与未名社 / 100

第二节 台静农与“鲁迅风范” / 116

第五章 现代安徽作家的小说创作与文艺研究 / 126

第一节 张恨水的现代言情章回体小说 / 126

第二节 蒋光慈与现代中国普罗文学 / 136

- 第三节 吴组缃的社会剖析小说 / 147
- 第四节 苏雪林及其创作 / 156
- 第五节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在宿州等地的经历及文学创作 / 167
- 第六节 阿英的“力的文艺” / 176
- 第七节 朱光潜的京派文艺批评 / 187

第七编 当代安徽文学

第一章 五彩斑斓的当代安徽文学 / 199

第二章 当代安徽文学四杰:陈登科、公刘、鲁彦周、严阵 / 209

- 第一节 陈登科奇特坎坷的创作道路 / 209
- 第二节 公刘的诗歌创作 / 218
- 第三节 鲁彦周的小说、戏剧、电影创作 / 227
- 第四节 严阵的诗文创作 / 239

第三章 当代安徽作家的小说创作 / 249

- 第一节 江流的文学创作 / 249
- 第二节 刘克的创作道路 / 255
- 第三节 周而复的小说创作 / 262
- 第四节 肖马的小说创作 / 272
- 第五节 祝兴义的小说创作 / 282
- 第六节 石楠的传记小说创作 / 288
- 第七节 彭拜的历史小说创作 / 298
- 第八节 戴厚英的小说创作 / 304
- 第九节 曹玉模的小说创作 / 314
- 第十节 完颜海瑞的小说创作 / 320
- 第十一节 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 / 327
- 第十二节 耿龙祥、孙肖平、徐瑛、海涛、沙丙德的小说创作 / 337

第十三节 熊尚志、陈源斌、李平易、裴章传、杨小凡的小说创作 / 348

第四章 新时期崛起的安徽中青年作家 / 363

第一节 季宇的小说创作 / 363

第二节 许辉的小说创作 / 369

第三节 潘军的小说创作 / 376

第四节 许春樵的小说创作 / 386

第五节 徐贵祥的军旅题材小说 / 396

第五章 当代安徽诗人的诗歌创作 / 405

第一节 韩瀚的诗文创作 / 405

第二节 刘祖慈的诗歌创作 / 412

第三节 梁小斌的朦胧诗与“片断写作” / 419

第四节 海子的诗歌创作 / 429

第五节 林散之的旧体诗词创作 / 437

第六节 赵朴初的诗词曲创作 / 446

第七节 丁宁、宋亦英、刘夜烽、徐味、邹人煜的旧体诗词创作 / 452

第八节 陈所巨的诗文创作 / 467

第九节 那沙、贾梦雷、张万舒、玛金、徐子芳、时红军的诗歌创作 / 476

第十节 梁如云、贺东久、沈天鸿、杨键的诗歌创作 / 487

第六章 当代安徽作家的散文、报告文学及其他方面的创作 / 498

第一节 王英琦的散文创作 / 498

第二节 白榕、刘湘如、潘小平、苏北、徐迅的散文创作 / 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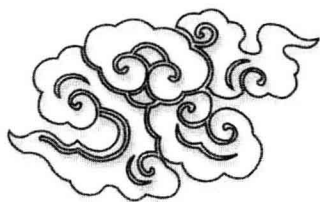
第三节 张锲、陈桂棣、温跃渊、高正文的报告文学创作 / 513

第四节 陆洪非、金全才的戏剧创作 / 523

第五节 舒芜、李何林、吕荧的文学研究 / 535

第六节 皖籍台港暨海外华人的文学创作 / 544

后记 / 565



第六编
现代安徽文学



第一章 走在文学革命前列的现代安徽文学

在中国现代史上,安徽文学界的先驱们,为文学的革命与创新奔走呼号、身体力行,为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在中国新文学草创之初,以胡适和陈独秀为首,安徽现代文学一马当先、冲锋陷阵,引领时代风潮,在刊物创办、理论提倡和文学创作等方面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典范作用。

首先值得提到的是,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中,陈独秀创办的刊物,发挥了功不可没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中,学者们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进而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报刊研究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热点。毕竟报刊不但为文学作品的发表提供了园地,还体现了编辑者的审美理想,以及常常在报刊发表文章的作者们的大体相同的文学趣味,而且为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营构了对话性的公共空间,影响了文化风尚。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出第2卷时改名为《新青年》。它是在“通商口岸报刊”启发下创办的。这是现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刊物,空前绝后!无与伦比!在创刊词《敬告青年》里,陈独秀明确提出“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一时间应者云聚,纷纷撰写文章,批判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发生了意义非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自此,中国历史上的“现代”时期正式到来。试想,如果没有陈独秀,没有他创办的《新青年》,没有他提出的极具感染力的现代口号,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现代文学会不会发生?中国历史会不会在五四时期出现那种划时代意义的大拐弯?可以说:没有陈独秀,何来五四?没有《新青年》,何来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学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几乎都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学革命理论文章、胡适等人的第一批白话新诗、鲁迅的《狂人日记》等都由《新青年》推出,然后产生了深入持久的影响。由此可见,《新青年》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密切关系。当然,我们不能忽视《新青年》除在文学方面的影响外,在思想和文化等领域也曾经起到过的启蒙作用。1918年,陈独

秀又创办了影响也很大的《每周评论》。1919年1月《每周评论》第5号发表了周作人的重要文章《平民文学》。周作人在该文中径直提出著名的文学口号“为人生的文学”，进而提出“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的新文学的创作原则，成为文学研究会成员一致认同和追求的创作主张和创作目标。新时期以来，《新青年》研究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现代中国思想、现代中国出版和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门显学，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其次，从理论创建上看，胡适和陈独秀率先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他们提倡文学革命并非偶然，是时代风潮把他们推到了风口浪尖，并最终成为文学革命的弄潮儿。众所周知，在胡适、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之前，晚清一批知识分子如黄遵宪、梁启超等就已经着手变革文学，只不过他们是在旧的思想框架内对中国文学进行一些“微调”，没能肩负起文学革命的使命。一般文学史著作都认为，标志着发出五四文学革命先声的理论文章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尽管有人已经提出现代中国文学的起点可以上溯到陈季同的《黄衫客传》那里，上溯到晚清，乃至上溯到晚明，但是它们都没有撼动胡适和陈独秀这两篇文章开现代中国文学风气之先的地位。它们均被认为是文学革命的第一号、第二号宣言。作为第一号文学革命宣言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新青年》1917年1月第2卷第5号上。作为第二号文学革命宣言的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在《新青年》1917年2月第2卷第6号上。前者提出了掷地有声的文学革命的“八事”主张，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句”。后者提出了广有影响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不管是胡适的“八事”主张，还是陈独秀的“三大主义”，都是把矛头直接对准旧文学，要求对之进行一场革命，创作出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是新的现代文学。他们的主张立即得



到了五四文学先驱者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的热烈响应,并渐渐形成了文学革命的高潮。

在亡国灭种的危难时刻,安徽的陈独秀、胡适等人对于旧文化的“清谈”之风已是深恶痛绝,视之若敌,坚决与之决绝。陈独秀直呼:“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陈独秀文学革命的对象是“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这样的“十八妖魔”,其实,还包括以老子学说为代表的形而上思想。陈独秀甚至把胡适封为“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学的司令”,同时断然指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①由此可见陈独秀、胡适等人文学革命的磅礴气势与坚定决心。“文言亡国”、“旧文学亡国”成为许多现代知识分子的共识。胡适从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入手,深化文学革命。他说:“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②这就使得胡适提倡“伦理道德革命”有了强有力的“抓手”,使得反对旧道德、旧文学与建立新道德、新文学有机联系起来,使得文学革命、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能有机联系起来。

为什么陈独秀、胡适毫不留情地拿曾令安徽人引以为傲的“桐城古文派”开刀?因为“桐城派”是清代作家众多、影响最大的古文派。在乾嘉期间,流传着“天下文章其在桐城”的说法。桐城文法不只影响时人的创作,而且还影响到跨国语际文化交流。当年,严复、林纾就用桐城文法向国人译介西学。桐城派的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产生,肇始于方苞,他的“义法论”为桐城派奠基;刘大櫆承前启后,他的“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

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刊《新青年》,1917年2月第2卷第6号。

②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刊《新青年》,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

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丰富了桐城派的文论内涵;集大成者姚鼐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使桐城派文论体系日臻完整周密;此外,还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继承发扬了桐城派文风。桐城派所提倡的阐发儒家的“义理”以及“清真雅正”的文风已经与时代发展严重脱节,所以,在五四初期,当林纾不识时务,仍然在鼓吹“尊孔读经”时,很快被五四文学先驱们痛斥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钱玄同语)。在这个历史重大转折时期,以桐城派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成为历史向前发展的障碍。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全盘否定桐城派,像梁启超所说的“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①。申言之,在看到桐城派的历史惰性时,也应该看到它曾经是历史的推动力,同时,也还在作为一种文学资源与新文学保持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比如,它的内容与形式并重、徘徊于“文”与“道”之间的文论观念;比如,它所倡导纯正的文学品格,都是严肃文学向来所追求的。

在对待像桐城派这样的旧文化的态度上,陈独秀采取的是毅然决然的革命态度,表现出文化激进主义倾向。而胡适在批判桐城派的同时,还有所选择地传承桐城派文化。胡适十分肯定曾国藩以及桐城派末代传人的品格,能以“持平”的心态,看待桐城派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功过,他认为,桐城派古文的长处在于“甘心做通顺的文章,不妄做假古董”^②;而且,胡适文学“八事”主张里的“言之有物”与方苞的“古文义法”有渊源关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待旧文化,胡适的文化态度是自由主义的。在五四后期,由于派系斗争和学术逻辑的演进,北大章门部分弟子联络皖籍学人陈独秀、胡适等一致批判桐城派,造成了北大英美派与江浙派之间的派系争斗,使得新文化阵营分化。胡适开始发起“整理国故”运动,目的是想使人知道被历史神圣化了的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② 胡适:《胡适文存四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88页。



国学也不过如此,一方面重整已经被“分化”了的文化队伍,另一方面也促使国学与本土学术的近代化。我们不能把胡适五四后期的这种“文化复兴”简单地判定是“复古”、是“守成”,因为胡适从来就不曾激进过!以梅光迪、胡先骕、柳诒徵、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不是反对“科学与民主”,而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和“全盘西化”。他们认为文学革命在打倒孔家店的同时,也把儒家所提倡的“心性之学”之类的人文精神也否弃了,把维系中华民族文明几千年的文脉也给斩断了,所谓的新文化运动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同于胡适的采用杜威的实用主义去整理国故,梅光迪是继承其师白璧德的新人文精神,要在现代中国提倡新人文运动。这种影响波及近年力重建传统精神的新儒学。梅光迪的这种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被解读成保守主义。也就是说,在安徽现代文学发轫时,激进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和保守主义文化之间的相互激荡,为安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现代化和世界化的精神资源,从而催生了安徽新文学的发生发展,规划了安徽新文学未来发展的格局与走向。

在新旧文化激荡中,文学革命时期的安徽新文学首先要求摆脱“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等封建文学的传统观念。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里指斥:“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迄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扩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唐宋八家的“文以载道”与八股家的“代圣贤立言”是同一鼻孔出气,进而提出上面提到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陈独秀把改革文学的内容放在了重中之重的地位。陈独秀、胡适主张政治和文化上的平民主义,主张以欧洲19世纪资产阶级“写实主义”文学为楷模,“赤裸裸地抒情写世”。他们要把文学从封建宗法礼教的捆绑中解放出来,反对把文学当作说教的工具,想使文学凸显自身的主体性,从而能够独立起来。但是,他们也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之中:他们要反对文学载“封建”之道,但又要文学载“现代”之道,也就是说,其实,文学革命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偏向理性的传统,依然重视文学理性,而忽视了文学的非理性精神这一至关重要的实质,这就从根本上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精神向度

和思想深度。

最后,我们要谈到是文学革命时期,安徽的文学创作也是开风气之先的。文学革命时期的安徽新文学气势很大。陈独秀、胡适是这一时期的旗手,他们眼界开阔,站在时代的潮头,用全新的意识,引进“活”的文学观念,主张用“写实主义”、“浪漫主义”等现代文学表现手法和技巧来创作“新文学”,从而开创有别于旧文学的新文学谱系。为了给新文学提供样板,胡适按照他意念中的新诗标准,参照英美意象派作品,摸索着写出了一种叫作白话新诗的东西,并于1920年3月出版,取名为《尝试集》,目的是“要想把这本集子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贡献给全国的文人,请他们大家都来尝试试试”^①。此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纯属个人的新诗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胡适是中国新诗写作的第一人,是新诗的“老祖宗”。他的这些诗是践行他自己的“诗体大解放”、“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要须作诗如作文”等诗歌革命和新诗理想的初步结果。他自认为,其中的《老鸦》、《老洛伯》、《应该》、《希望》、《一颗星儿》、《威权》、《乐观》、《上山》等14首是理想中的白话新诗。尽管人们常常指责胡适的这些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的妇人”、“未能尽脱文言窠臼”,但是人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头一个放脚人的功劳,对于后来是深而且大的”。胡适否弃古诗的格律,用书面的白话来写诗,虽然没有像郭沫若那样明确提出按照诗人内在情绪的消长来写诗,但也是按自然的形式来写实抒情的。对百年新诗写作来说,胡适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自此,人们知道了新诗应该是一个什么面目,乃至该如何写了。总之,在胡适、陈独秀的感召之下,安徽的文学精英云集响应,他们自愿结社、办刊办报、精心写作、相互砥砺、共同提高。这就有了与安徽新文学密切相关的各种新文学社团。汪静之与友人建立湖畔诗社,在胡适的帮助下,他出版的情诗集《蕙的风》,以自己的“胆颤而心寒”令当时整个旧道德的遗老遗少们也“胆颤而心寒”!同时,激起了一场关于文学道德与不道德的论争,周作人

^① 胡适:《尝试集·自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



等站到了汪静之一边,为汪静之这些诗所颂扬的“新道德”而击掌叫好,使得《蕙的风》成为20世纪20年代有影响的新诗集之一。朱湘、方令孺、方玮德等都是新月派成员,在现实与唯美之间写作浪漫主义新诗,尤其是他们对诗歌“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陈梦家语)的唯美追求,他们量体裁衣的诗式探索,赢得了诗界的赞誉。当年,方玮德死后不久,闻一多曾撰文以方玮德的诗歌作为诗歌创作的圭臬与衡量诗歌的标尺。20世纪20年代,安徽的皖西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体,有台静农、韦丛芜、韦素园、李霁野等,他们在鲁迅的指导下,从事创作与翻译,成立了未名社、莽原社。他们都受到鲁迅的影响,表现出现实主义创作倾向。其中,韦氏兄弟和李霁野的翻译成就十分巨大,台静农的小说创作则比较突出。台静农是早期乡土小说派作家,他的小说集《地之子》出版后,鲁迅称其是难见的“优秀之作”,而且,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鲁迅把自己的4篇小说“打头”,而将台静农的4篇小说“殿后”,足见鲁迅对台静农小说的推崇。还有曾任上海大东书局总编辑的章衣萍,与鲁迅筹办《语丝》月刊,是重要撰稿人,系“语丝派”成员。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安徽新文学作家的参与和贡献,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不知道会有多么黯淡啊!反过来说,正是这些优秀的安徽新文学作家的组建或加盟,才使得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这些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光耀史册。那个时期,被誉为“中国的巴尔扎克”的张恨水,通过其数量惊人的现代社会言情小说写作和抗战小说写作,使得现代中国文学传统文化现代化、大众化以及长篇章回小说文体现代化,其成功的“说故事、写人物”的写作模式,为现代中国作家职业化树立了典范。总之,经过陈独秀、胡适和这些安徽新文学作家的共同努力,文学革命时期的安徽文学创造出了不朽的文学辉煌,为现代中国文学树立了新的典范,开创了新的写作范式,成就了新的文学经典。

文学的现代性、世界性也是文学革命时期安徽新文学的理想和追求。那时,安徽新文学作家几乎都接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在国内知名大学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或在那里任教。尤为可喜的是,不少安徽新文学作家留学欧美

或日本,比如,胡适和朱湘就留学美国,陈独秀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过书。这些教育背景使他们眼界大开,而且切身感受到西方现代文明和进步,因此,激起了他们改变旧中国面貌的豪情和理想。所以,他们要以世界先进的文学观念来改造国内陈腐文学,努力使本国文学跟上世界先进文学发展水平。同时,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世界文学,并参与新文学建设,他们还主动译介了大量西方著名作品和文学理论著作。正是这些切实有效的工作为现代中国重新“造血”、“换氧”,从而使得现代中国文学的新生儿得以产生,并渐渐长大。有的作家虽然没有出国留学,但是这并不表示他就没有世界眼光和远大抱负,比如,台静农在中学时期就立志要“立定脚跟撑世界,放开斗胆吸文明”。

由此,我们看到,文学革命时期的安徽新文学起点高、观点新、成就巨大,尤具开风气之先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章 陈独秀与胡适的文学革命

中国的新文学革命不能不提到两个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胡适。他们都是安徽人,他们在现代文化史、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将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愈加显现。

第一节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陈独秀(1879—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1896年中秀才。次年入浙江求是书院学习。因发表反清文章被通缉,赴日本留学。1902年为反对《中俄密约》回国,在安徽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与柏文蔚等组织岳王会,进行反清斗争。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此后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到日本。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新青年》),倡导新文化运动。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次年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参加领导五四运动。次年4月与李大钊等人会见共产国际派来的第一位使者魏金斯基,就建立共产党问题进行商谈,建议其拜会孙中山。9月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2月应陈炯明之请到广州任广东革命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总书记。在上海与国民党领导人张继会谈,表示坚决支持孙中山。1922年与李大钊率先加入国民党,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1924年1月被孙中山指派为国民党“一大”代表,未出席。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写信给共产国际,建议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联盟。1927年“八七会议”后被撤销总书记职务。次年拒绝出席中共六大。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2月15日与彭述之等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在上海成立“托派”组织。1931年5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出任总书记。次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中